

宗教与人的冲突与和解：‘丽达与天鹅’诗画之我见

孙雨晗

(湖南大学, 湖南省, 长沙市, 410000)

摘要：米开朗琪罗的画作和叶芝的同名诗作《丽达与天鹅》均再现了宙斯化作天鹅诱奸丽达的场景。不同的是，画作强调和谐，弱化冲突；诗作以厚重的历史感凸显冲突。本文从画作与诗作本身出发，探究各自的时代背景，从而分析以米开朗琪罗为代表的文艺复兴时期和叶芝为代表的十九世纪后期，艺术家们对同一主题的表达的相似点和不同点，以及两者不同的必然性。

关键词：《丽达与天鹅》 和谐 冲突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丽达与天鹅的故事本是一则希腊神话，后经艺术家们理解、加工，先后以壁画、雕塑、绘画、音乐和诗歌等形式再现。其中，叶芝的同名诗作及米开朗琪罗的同名画作为人津津乐道，流传至今，堪称经典。两者均传神地再现宙斯诱奸少女的情境，其中所蕴含的暴力美学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但如果进一步思考，我们发现暴力的根源在于神和人的冲突，美的感受植根于冲突时的艺术张力和冲突过后的和谐。反观画作和诗作出现的背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质疑宗教神学，用尽全力渴望摆脱中世纪天主教带来的人身禁锢和思想禁锢，这一挣脱、逃离的过程恰好是宗教与人的冲突的表象。但是，文艺复兴并没有带来宗教的消亡，反之，它带来了宗教的改革，使其以另一种形式复兴，最终人和宗教融为一体，归于和谐。因此，我们将天鹅宙斯视作神的化身，丽达视作人的代表，从丽达与天鹅的交融和冲突中窥见文艺复兴时期人和宗教的辩证关系，并以此为依据，赏析叶芝的同名诗作 *Leda and the Swan* 及米开朗琪罗的同名画作 *Leda and the Swan*。

一、至暗将明：宗教的黑暗和人的思想觉醒

欧洲的中世纪可谓是欧洲历史长河中的至暗时期，本该神圣的宗教被人的贪欲亵渎，成为玩弄权术、大肆敛财的工具。从政治层面看，教权在与王权的拉锯式斗争中逐渐占领上风，随着“君权神授”的思想深入人心，王权沦为教权的附庸。从救赎层面看，被称为“圣战”的十字军东征虽然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本质上是一场清除异教徒、掠夺财富的“殖民运动”，同时，士兵来源于当时的“罪人们”，教皇以上帝的名义将他们从炼狱赦免，还给予免付欠债利息，甚至免除税务的福利，这种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救赎”使得底层人民前仆后继。从体制层面看，等级森严的教阶体系呈“教宗—大主教—主教—司铎—教徒”的金字塔式辐射，形成以教皇为实际权力中心的中央集权制。不论从以上哪一层面看，最终结果均为宗教以极其霸道的方式对人进行剥削。

在这一时刻，人们面临两个选择，“一种是顺应罗马教会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撕破虚幻的神性面纱，理直气壮地为人性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另一种则是以虔诚的信仰来对抗堕落的教会，以圣洁的神性来驾驭败坏的人欲，重振早期基督徒的纯真信仰和淳朴道德。”（赵林，29）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最终走向变革——文艺复兴。但这种变革，并没有反基督、反罗马教会，相反，文艺复兴时期所强调的“自由”、“解放”为奢靡腐朽的教权添薪加柴。此时的人们将希望寄托于古希腊罗马文化，但“文艺复兴运动效法古典文化而热情讴歌的现世享乐，恰恰就是罗马教皇和有教养的主教们向往已久的；而人文主义者们所大力弘扬的人性之美，对于教会权威来说也无伤宏旨。”（赵林，31）因此，尽管人们渴望宗教改革，但这种改革恰好和罗马教会的需求不谋而合。

由此可见，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依旧笃信基督，两者血脉交融，不可分割，但不同的是，人们认识到对基督教的认知已走入误区，并希望寻求更强有力的支撑来重建宗教的权威，因此产生些许冲突，而这种冲突最终湮没在了宗教的威严中。在《丽达与天鹅》中，宙斯化作天鹅诱奸丽达，不谙世事的丽达先半推半就，而后屈服，这一“冲突-和解”的过程正符合文艺复兴时期，宗教与人的关系变化过程。

二、冲突的艺术表达：叶芝诗作分析

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被誉为“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其作品早期颇有浪漫主义色彩，后来受到庞德（Ezra·Pound）的影响，作品又颇有现代主义风格。Leda and the Swan 一诗出版于 1928 年，属于叶芝晚期作品，本诗采用十四行诗的形式，对天鹅诱奸丽达这一场景进行刻画。全诗如下：

猝然一攫：巨翼犹兀自拍动，
扇着欲坠的少女，他用黑蹼
摩挲她双股，含她的后颈在喙中，
且拥她捂住的乳房在他的胸脯。
惊骇而含糊的手指怎能推拒，
她松弛的股间，那羽化的宠幸？
白热的冲刺下，那扑倒的凡躯
怎能不感到那跳动的神异的心？
腰际一阵颤抖，从此便种下
败壁颓垣，屋顶和城楼焚毁，
而亚加曼侬死去。就这样被抓，
被自天而降的暴力所凌驾，
她可曾就神力汲神的智慧，
乘那冷漠之喙尚未将她放下？

（余光中译）

本诗前九句侧重于场景的再现，通过一系列的对比，完成冲突的视觉化表达。

第一重对比是冲突的主角——天鹅和丽达的对比。天鹅咄咄逼人，全诗以“猝然一攫”开始，立刻营造了一种紧迫之感，紧接着，天鹅从“巨翼犹兀自拍动”，到“黑蹼”扼住少女的颈背，最后“腰际一阵颤抖”，一步接一步，一环扣一环，让人感受到其步步紧逼的强硬态势。反观丽达，她是一位“staggering girl”，犹豫和踌躇占据她的心间，面对侵犯，她依然肌肉松弛，没有恐惧，这不是因为她勇敢，而是因为她不谙世事。尽管她的指尖透露出她“惊骇而含糊”的情感，但这一点小小的推拒并无大用，希腊战争的悲剧的种子从此种下。

第二重对比是因和果的对比，宙斯诱奸丽达后，丽达诞下两个女儿，一个是海伦，引发了特洛伊战争，带来了“败壁颓垣，屋顶和城楼焚毁”，另一个是吕泰涅斯特拉，当她的丈夫阿伽门农在英雄伦理和亲情伦理的天平上向前者倾斜，选择献祭女儿，她也在战争结束时，亲手杀了自己的丈夫，不幸地陷入伦理的悖论。“因”是快乐的冲击，是战栗，是颤抖，但“果”却是苦痛，是悲剧的深渊。因与果的对比加深了冲突的对立，升华了诗歌的主题。

上述双重对比凸显了宙斯与丽达的冲突，大而化之，便是宗教与人的冲突。宙斯不顾少女的意愿将其诱奸，而后诞下女儿，致使希腊人民惨遭战争的不幸和伦理的折磨。因此，我们认为，宗教以绝对主导的地位支配着人类的行为，从肉体和精神上对人类降下双重枷锁。

三、桎梏与和解：米开朗琪罗画作分析

米开朗琪罗的《丽达与天鹅》构图简单，在一块被随意铺陈的红色幕布上，天鹅与丽达在交缠，两者结合着的静态肉体占据了画作的绝大部分版面。

艺术界对米开朗琪罗曾有着“不了解真实的女性的裸体”的论断，但实际上，“米开朗琪罗为跪在《下葬基督》中左下角的女性而作的草图（巴黎卢浮宫）表明，他偶尔是面对女性模特儿写生的……这一素描却证明，他是熟悉女性的裸体的。”（乔纳森·K·奈尔逊，丁宁，54）尽管如此，米开朗琪罗在画作《丽达与天鹅》中，依旧将丽达塑造成同时具有女性生理特征和男性肌肉特征的人，一方面，丽达只是表现艺术张力的一个符号，而这一符号同时蕴含了男性的阳刚之美和女性的阴柔之美，从而在画作中代表了广义上的“人类”概念；另一方面，女性生理特征使男性趋之若鹜，同时男性的肌肉之美是吸引女性的法宝，丽达两者兼而有之，更能表现出她对男女两性的吸引力，这种“无差别的吸引力”让丽达这一美女形象更加传神。这种别具一格的塑造方式成就了米开朗琪罗，使其艺术作品具有鲜明的个人特征。

画作中，肌肉赋予丽达的力量感与丽达的个人处境形成巨大反差，给予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肌肉意味着力量，拥有强壮身躯的丽达在体格上远超瘦弱的天鹅，只要稍加反抗，便能将天鹅翻到在地。但画作中的实际情景却正好相反，天鹅用它的翅膀挟制住了丽达，并以侵略者的姿态从上而下将丽达侵犯。更为特殊的是，丽达在面对侵犯时，不仅没有反抗，反而以一种自然、放松的状态面对侵略者。画作中的丽达左手自然地垂下，右手环抱住天鹅，轻轻搭在自己的大腿股间，面带微笑，伏下头亲吻天鹅，尽管肌肉突出，但未见青筋，可见丽达虽然被压制、被强迫，却处于一种逆来顺受的放松状态。

综上所述，宙斯之于丽达等同于大他者之于人，拉康指出“人的欲望就是大他者的欲望”（Lacan, 525），而在该作品中，“大他者”就是指宗教。人的意识由宗教控制，即使受到侵犯，也仍旧渴望救赎。

四、诗画之我见

在本文第一部分我们说到在文艺复兴时期，宗教与人存在着“冲突-和解”过程，这一过程在叶芝的诗作及米开朗琪罗的画作中均有体现。叶芝的诗作中，宙斯化作天鹅的外形，以强势的姿态侵犯丽达，丽达先是推拒，产生冲突，接着屈服，与冲突和解，最终宗教与人合二为一。米开朗琪罗的画作中，天鹅的压迫感便是冲突的来源，但丽达顺服的态度使得冲突最终消融，与诗歌殊途同归。从艺术创作这一宏观角度来看，两者均为佳作，因此我们从宗教与人的“冲突-和解”过程的表现手法这一角度，来评价两种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诗作和画作之间拥有许多共性，但我们仍然认为，两者在表达重点和艺术张力上有不同之处。

叶芝的诗作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诗歌前九句，还原故事场景，第二部分为后五句，叙述故事所带来的历史影响，两个部分的时间跨度之大，波及范围之广，都充分表现了诗歌中史诗般的历史厚重感。在这壮观的历史背景下，时间和空间同时反作用于冲突的表达，冲突不再局限于天鹅和丽达之间肉体的冲突，它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扩大不断向外延伸，涵盖了因与果的冲突、精神和肉体的冲突、亲情伦理和英雄伦理的冲突、个人与集体的冲突、国家间的冲突等等，但是，这一切冲突的来源，是宙斯与丽达的冲突，也就是宗教与人的冲突。正如宗教与西方文明的关系那样，尽管宗教牢牢掌控着人们的心灵，但人的思想数次反作用于宗教，直接导致了宗教的流变，但从始至终，宗教与人水乳交融，难分其二。米开朗琪罗的画作在冲突的表达上稍逊一筹，更多体现“和解”或是“和谐”。丽达面对侵犯时归顺的态度降低了冲突的张力，同时也增添了和谐的色彩。不论是天鹅与丽达的融合，还是丽达躯体的描绘中男性与女性特征的融合，抑或是人体与环境的融合，都给予人们宗教中纵欲的神秘色彩。因此，画作强调和谐，势必弱化冲突的表达。

综上所述，画作过分强调宗教压迫下，人们顺服的态度，同时过分强调宗教与人的交融，因此我本人更倾向于宏伟而磅礴，激烈而富有张力的诗歌。

五、结语：差异的必然性

米开朗琪罗的画作和叶芝的同名诗作《丽达与天鹅》虽然叙述同一个故事，但仍存在表达思想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的存在的确具有必然性。米开朗琪罗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他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完全依附于宗教的盛行，虽然此时对宗教的质疑已经萌芽，但这些质疑面对统治了欧洲几个世纪之久的罗马教会，难以深入，只能浮于表面、流于形式，但这也恰好极大的推动了欧洲艺术的发展，只不过这些发展和宗教的革新一样，虽然在形式上出现了“裸体”、“性爱”等曾经让人讳莫如深的主题，但其本质依旧臣服于宗教。与此不同的是，叶芝成长于十九世纪后期，此时尼采已经发出石破天惊的“上帝已死”的论断，最强有力的宗教改革也已经过去，社会形态及人们的思想状态与文艺复兴时期全然不同，此时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宗教对人们的影响相对减小。因此，叶芝笔下的“人”和米开朗琪罗笔下的“人”相比，前者更具抗争精神和自主精神。

参考文献

- [1] 赵林.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文化意义[J].求是学刊, 2018, 45(05):29-36.
- [2] 乔纳森·K·奈尔逊,丁宁. 米开朗琪罗与达·芬奇以及提香在女性裸体形象描绘上的较量[J]. 艺术工作,2016,06:54-59.
- [3] Lacan. Crits: the First Complete Edition in English.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6.

The Conflict and Reconcilia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Human: Opinions on the Poems and Paintings of "Leda and the Swan"

Sun Yuhan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00)

Abstract: Both Michelangelo's paintings and Yeats's poem of the same name "Leda and the Swan" reproduce the scene where Zeus turns into a swan and seduces Leda. Painting weakens the conflict and emphasizes the harmony of the picture, while the poetry highlights the conflict with a heavy sense of history. Starting from the paintings and poems, this thesis aims to explore their era backgrounds, so as to analys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expressions of the same subject by artists during the Renaissance represented by Michelangelo and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represented by Yeats.

Keywords: Leda and the Swan, Conflict, harmony